

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

冯碧梅 赵涤非

摘要:将国际贸易理论和新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贸易政策制定,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分支。现有文献通过构建贸易政策内生模型,研究了贸易政策政治决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探索政治经济因素互动下贸易政策的生成机制,政府作为“调停人”、“自治者”以及利益集团在政治决策中的角色定位和影响。本文希望通过梳理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脉络、贸易政策政治决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政府和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决策中的角色定位,有助于我国贸易政策的妥善制定。

关键词:贸易政策 政治经济学 利益集团 贸易保护

贸易自由化是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但是各国出于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各方面考虑,时常采用贸易保护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倾向融合经济学与政治学研究方法,研究贸易政策内涵,推动了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兴起。目前,学术界对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研究遵循两个视角:一是强调政治参与者的经济私利;二是强调选民和官员对社会关注的考量。

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将公共选择分析范式引入新古典贸易理论,试图解释政府为何实施各种贸易干预政策。贸易政策政治经济理论考虑了政策制定的政治背景,能够较为全面揭示影响贸易政策形成及其变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因素(Baldwin,1996)。所以,本文将系统梳理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脉络、贸易政策的政治决策过程、度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政府在贸易政策决策中的角色定位等内容,以期为新时代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提供理论借鉴。

一、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脉络

政府、官员、选民、公众以及利益集团等参与者在贸易政策的决定过程中根据其自身既定目标或既得利益产生对贸易政策的需求与供给。贸易政策博弈结果影响他们的计划目标和利益,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对于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研究分类,Baldwin(1996)根据政策制定者目标的不同,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角度进行研究;Rowley(1995)根据参与决策者角色的不同,从“选民”、“利益集团”和“立法机构”角度进行研究;Rodrik(1995)根据利益集团行为特征的不同,从“政治献金”和“政治支持”角度进行研究;Neilson(1988)和 Pant(1988)从政策供需关系角度,将贸易保护政策理论研究分为“政治需求型”、“政治供给型”和“政治需求和供给型”。这些分类方法各有特色,相互补充。

本文采用 Baldwin(1996)分类方法,将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研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建立在经济学理性基础上,政策制定者、官员、公众、利益集团、外国贸易伙伴或竞争对手等主要参与者以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根据 Grossman & Helpman(1995)对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研究分类,这类贸

* 冯碧梅、赵涤非,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350116,电子邮箱:583393142@qq.com, difeizhao2009@163.com。基金项目:福建省软科学项目“公共关系视角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区域治理研究”(2017R0005);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福建模板:公共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区域治理研究”(JAS160605)。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易保护理论又可分为关税形成理论(Findlay & Wellisz, 1982)、政治支持理论(Hillman, 1982)、直接民主理论(Mayer, 1984)、选举竞争理论(Magee et al, 1989)。第二类是强调政策制定者对社会福利的关注,这一类理论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联合提出来的,这些模型也采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它们被看作是内生贸易模型,其中保护代售模型是其代表性理论。

(一) 关税形成理论

关税形成理论分别由 Findlay & Wellisz(1982)和 Feenstra & Bhagwati(1982)提出。他们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第一,使用的要素种类不同。Findlay & Wellisz(1982)的关税形成模型假定利益集团游说使用的资源只有劳动要素,根据两部门特殊要素模型构造关税内生一般均衡模型,进口竞争产业需要保护,出口产业集团要求自由贸易,双方分别动用资源通过游说来影响关税水平。Feenstra & Bhagwati(1982)的关税形成模型假定利益集团游说使用的资源不仅有劳动要素还有资本要素,并且假定存在不变规模收益和完全竞争的两个部门,两个部门在生产过程中都使用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第二,政府动机不同。Findlay & Wellisz(1982)的理论假定政府是自利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Feenstra & Bhagwati(1982)的理论假定政府不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关心公众福利。Feenstra & Bhagwati(1982)的理论属于 Baldwin(1996)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第二大分类。其中,政府需要设计一种贸易政策来平衡特殊利益集团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政府对贸易政策的考虑不仅是国家内部多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税博弈,还是国家之间的关税博弈。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外国游说的影响、关税对多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及贸易政策替代等方面展开。在外国游说的影响方面,Stoyanov et al(2009)使用了垄断竞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研究了外国游说对自由贸易协定(FTA)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影响。在关税对多边区域经济的影响方面,Marks(2015)使用局部均衡模型评估“东盟 10+1 协议”对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从这些估计中分析该协议如何对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产生影响。Leonardo et al(2018)研究了 1995—2013 年间 50 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签署的 61 项优惠贸易协定,并分析因关税下降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还检验有关产业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对经济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通过产业内贸易协定,中间产品的关税下降要比制成品快得多。这与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贸易自由化的论点是一致的。同时也表明,产业内贸易对贸易自由化宽松度的影响表现出国别差异。

(二) 政治支持理论

Hillman(1982)提出的经济管理理论假设,政府目标是追求政治支持最大化而不是寻求社会福利目标,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产业利益集团以及消费者的政策支持,需要在利益集团与消费者之间做出权衡,关税税率的选择可以看作是最优化问题的解。Hillman(1989)指出贸易保护政策是失去竞争优势的衰退行业向政府游说的结果。但是,贸易保护程度的提高不能完全补偿衰退行业由于企业产出世界价格的下降而遭受到的损失。所以当世界价格下降时,无论提高还是降低保护性关税,衰退行业将继续衰退。贸易保护政策也许能暂时阻止产业衰退,因而能够为产业特定资产的所有者提供更多的时间来适应不利的贸易变化,但是最大化的政治支持也可能加快产业的衰退。Bechtel et al(2012)基于瑞士调查数据,衡量个人对环境的关注程度以及对贸易政策的偏好,检验更加关注环境的人是否拥有更高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研究结果表明,关注环境的人更倾向于认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影响,更加坚定支持与就业相关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且在评估外国产品时更加重视价格和质量以外的东西。Karacaovali et al(2015)则使用政治经济学模型研究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决定因素和贸易改革,得出政府通过平衡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政治支持来确定关税,同时相对于普通选民,生产者福利具有更高的政治权重。

(三) 直接民主理论

在直接民主制度下,假设每一位选民都直接参与投票,此时,处于所有投票者最优偏好结果的中间状态的投票者(即中位选民)的决定作用是明显的。Mayer(1984)提出了关税形成的直接民主模

型,即中间选民模型。该模型假定个人收入是其拥有的多种生产要素收益和再分配的关税收入之和,国家关税率由全民投票来决定。中间选民对部门专用要素所有权拥有的份额越高,关税的税率就越高,该部门的产量也就越高。更高的产量水平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则高关税就更加有利可图。进口需求函数的弹性越小,关税的额外负担就越低。这个额外负担部分是由中间选民承担的,因此,边际成本越低,高关税就越受到偏爱。但是,由于多数国家是代议制民主国家,贸易保护措施是在代议制民主环境下形成的,所以直接民主模型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Krishna(2005)将中间选民模型运用到双边贸易协定、多边贸易协定中,研究从封闭经济走向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过程中国家可能出现的损益情况。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方法是假设个人和团体政策偏好反映个人经济利益的追求,然而最近研究成果表明,选民对贸易政策没有经济自利方面的偏好。Houseman et al(2014)对此假设提出了质疑,通过选民问题进一步解释有些贸易政策在选举中更加有效。贸易模式取决于选民自身利益和对不同程度保护主义的偏好,贸易成为这些选民最关注的问题。通过研究可知,多数选民不了解保护主义政策的经济后果。如果选民更多地了解贸易的分配效应,则个人利益与政策偏好之间的相关性将会加强(Rho et al,2017)。在中间选民模型拓展研究中,通过研究一些国家的经济部门发现,税收、补贴、贸易保护等政策效果更为显著。

(四)选举竞争理论

在选举竞争过程中,利益集团通常会给政党和候选人提供捐献以提高他们当选的可能性。Magee et al(1989)研究了贸易保护政策形成中的政党竞争问题。假设存在两个政党,在利益集团捐献之前就表明自己的政治偏好,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不影响其政策立场,而只影响不同政党当选的可能性。通过两个利益集团最大化期望收益和两个政党最大化当选的博弈均衡解得出政党选择的贸易政策。游说集团会向两个主要政党提供捐献,而且非常普遍,但 Magee et al(1989)假定一个游说集团最多只能向一个政党提供捐献,其他的学者扩展了这方面的研究。Tovar et al(2011)研究了内在游说成本如何影响贸易政策。在该模型中,信息游说成本在确定保护结构中起作用,特殊利益群体可以选择向决策者发送有关其拥有的某些信息的信号,重要的是,决策者在制定贸易政策之前会观察到该信号。研究表明,游说支出在解释跨部门保护差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该模型认为社会福利相对于政治捐款的权重大大降低。Kagitani(2011)研究了工会及其母公司的游说对双寡头战略出口政策主张的影响。与自由贸易相比,由游说引起的出口政策经常使国内福利恶化。如果工会的议价能力强且国内政府对政治捐款的反应能力较弱,则由政治决定的出口政策可以改善国内福利。但是,即使满足条件,实施由游说引起的出口政策也不会比改善劳资关系更能提高家庭福利。此外,游说将阻碍他们之间关系的改善。这些结果表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应限制工会及其母公司的游说影响双寡头的战略出口政策。虽然之前有学者认为,国外利益集团对政府贸易政策的游说对国内经济是有损失的,但这种游说很可能会减少贸易壁垒,提高消费者剩余,进而提高该国的福利(Gawande et al,2012)。基于投票净捐款模型,Oladi(2012)研究了利益集团对美国立法者在国际贸易政策问题的潜在影响,研究表明,对于工会和其他公司集团而言,这些捐款非常有效。Lee(2017)在自由贸易协定下研究了外国游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国游说活动的存在对国内贸易政策有重大影响。在FTA合作伙伴国家中,有组织的游说团体的存在往往会增加贸易壁垒,而如果出口商来自FTA以外的国家,有组织的游说团体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较少。

(五)保护代售理论

Grossman & Helpman(1994)提出了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献金模型,即“保护待售”(protection for sale)模型,该理论是迄今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在该理论中,本国政府不仅最大化国民福利,而且关心从每个游说集团那里获得的捐献。模型分析表明,利益集团的政治献金应集中于已胜出的当权政府,包括均衡关税也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总体利益集团人数比例以及是否有效地组成利益集团。只要产业内部存在利益集团,并向政府提供政

治贡献,其便可享受到关税保护。而未成立利益集团的产业则需忍受负保护。Facchini et al(2006)将产品替代率引入到“保护待售”模型当中发现,如果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的替代率越大,那么本国产品所在行业得到的贸易保护就越强。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决策过程趋于复杂,也导致了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加剧,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知识产权的决策过程可知,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是由政府、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的博弈决定的。由于各行业政治组织条件的不同,知识产权产业的保护率也不同,这将引起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的摩擦(Wu,2011)。Gu & Shen(2014)通过“保护待售”模型构建了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保护政策影响因素分析模型,考察了中国贸易保护政策中的政治影响因素,并且利用2004—2012年间中国36个行业的数据对结论进行了经验验证。

在利益集团游说方面,借助“保护待售”模型得出中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通过影响贸易逆差与政治捐献的相互作用来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美技术差距缩小、贸易逆差(或进口渗透率)和利益集团政治游说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因素对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较小。在存在利益集团政治游说的情况下,中美技术差距缩小和贸易逆差(或进口渗透率)增加提高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概率(Yang et al,2018)。Amrita(2019)通过对政治组织的度量来估计印度的“保护待售”模型,利用面板数据来评估相对游说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对于最有效的部门来说,高产出比意味着更高的贸易保护;对于效率最低的行业,产出与进口之比越高,贸易保护就越低。

二、贸易政策政治决策形成、度量指标与影响因素

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贸易政策的政治决策过程、形成机制、指标选择和度量、影响因素等,都是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一)贸易政策政治决策过程

贸易政策是各个国家使用政治手段决定经济制度,而对其的政治经济研究就是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的综合研究,是各国国内政治经济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如实反映各种集团利益决策的政治过程。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试图从贸易保护政策政治决策过程的角度,探究贸易保护和贸易干预的原因、水平、结构、形式及其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贸易保护政策的“科学”认识(Grossman & Helpman,1995)。现有文献从贸易政策政治决策过程的角度,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探究了贸易收入分配规则、群体间收入分配、贸易开放、生产要素可替代性、行业就业规模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影响因素对相关主体政府官员、利益集团、国际组织等的行动方式的影响。

在贸易政策政治决策过程中,影响因素看作是输入变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手段看作是输出变量。在贸易引力模型框架下,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手段依然是低收入水平国家贸易保护的重要措施(Hoekman & Nicita,2010)。Wang et al(2015)在利益集团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混合寡头垄断模型,研究了利益集团中最优私有化和贸易政策的关系。研究表明,最佳政策组合是利益集团的部分私有化和加征关税。

贸易保护主义是“自然的”,从贸易保护政策中获得的收益受到贸易条件的影响(Haaland & Venables,2016)。因此,各国在没有来自其他国家压力或与其他国家有共同期望的情况下,通常不会对相互竞争的进口产品开放;只有当官僚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时,它们才会这样做。贸易保护程度因政治体制或政权类型而异。例如,以议会(而非总统)和以候选人(而不是以政党为中心)的选举制度往往有较高的税率。Hatch(2017)认为,有组织和集中的利益集团所代表的一方总是更有能力确保不受进口的影响,因为它们有更大的能力克服集体行动问题。Acharya(2018)的研究成果也表明,政府采取进口关税的优惠措施而非出口补贴是游说的结果。Kim et al(2019)党派竞争导致现任政府采取有助于确保其选民支持者获得经济利益的政策,而这种受益是以反对派支持者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

贸易政策政治决策过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数目少、地理集中度高、买方集中度高的行业更容易形成游说,并且这些行业获得保护水平的能力也较强。最新研究表明,如果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利益集团模型,那么贸易政策的政治决策过程将受到企业游说能力的影响,而企业规模越大游说能力越强(Bombardini,2008)。Mukherjee et al(2009)将劳动力流动程度引入利益集团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当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性变弱时,民主国家更容易采取保护贸易的政策。生产最终产品的利益集团和中间投入品的下游利益集团的游说竞争会影响贸易政策政治决策的过程。

Thies(2015)通过分析经合组织国家农业生产者支持的政治决定因素发现,农业和工业部门的保护主义外交政策存在相似性。农业生产者的政治支持模式与其他产业的保护主义模式相似。Ina & Marcel(2017)运用 H-O 模型研究了贸易政策的分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保护政策引起的要素价格变化与自由贸易的要素含量呈负相关,即要素价格上升,自由贸易的程度下降。还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跨群体和个人的保护主义需求的变化,认为大多数农民希望从贸易保护中获得贸易保护,这是因为他们通过贸易保护获得的人均收益通常较高。

关于贸易政策的另一个问题是,贸易政策政治决策是否有助于国内稳定和经济增长,利益集团游说下的保护主义政策是否提高了经济增长(Canto & Wiese,2018)。在极端情况下,贸易保护和利益集团游说可能会弄巧成拙的。Acharya(2018)运用一般均衡框架研究了一个小国的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决策过程,研究结果与现有文献相反,游说行业得不到贸易保护,甚至可能面临贸易税。显然,除了利益集团和企业游说等影响因素外,贸易政策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如贸易收入分配规则、群体间收入分配、贸易开放、生产要素可替代性、行业就业规模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Cerdeiro & Nam(2018)提出并讨论了一套有助于评估各国贸易政策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这些影响因素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其研究表明,受这些些因素影响,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演进,正朝着保护主义的体制演变。

(二)贸易政策政治决策形成机制

为了在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自由及公平贸易观念”取代了“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之争”(Baldwin,2009)。自由及公平贸易是一种有选择的贸易自由化,将贸易自由化限定在特定产业部门和特定贸易伙伴之间。中美贸易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中美贸易政策决策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美贸易政策政治决策背后隐藏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形势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取向,强烈影响着两国贸易政策走势。公众持有的贸易观念的变化也增加了贸易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政治分歧。现有文献主要是扩展了“保护待售”模型,通过在原始模型中纳入执政者谋求竞选支持和进行权力委派的因素,考察了执政者、行政机构同各类选民互动,最终决定贸易政策的机制。现有文献通过构建揭示贸易政策内生过程的理论模型,整合贸易理论、选举理论和权力委派等经济学分支,并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揭示了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

从利益集团看,贸易不平衡、汇率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失业和不公平贸易成为工商业更为关注的问题(Nakayama et al,2006)。Barros et al(2019)认为,南方共同市场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追捧,这种吸引力的突然增长反映了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变化。Francois & Nelson(2014)的研究表明,美国与欧洲、亚太国家(不含中国)谈判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旨在建立贸易管理机制,为长期主宰贸易政策的特殊利益服务。Di Tella & Rodrik(2019)在研究政府行为偏好和不同类型劳动力市场冲击导致裁员问题时发现,在技术变革、需求转移和国际外包等情况下,美国进口保护和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需求显著增加。显然,为应对这些冲击,利益集团对政府干预急剧上升,贸易政策更偏向贸易保护主义。

从经济形势来看,近年来西方发生包括移民、国际贸易、技术进步、欧元引入和气候政策等政治经济事件损害了工薪阶层和许多中产阶级的利益。中美贸易争端、英国脱欧、欧盟及其成员国间贸易政策等问题的政策处理都应是根据国家政策重新商议的(Van der Ploeg,2017)。Inkyo et al(2018)评

估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美国进口关税的提高会给美国以及适用进口关税提高的相应国家或地区造成经济损失。如果仅增加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那么就不会对其他东亚国家产生任何溢出影响。但是,如果对所有国家和所有产品征收边境调整税(BAT),那么将促进美国经济增长。这样,发达经济体将保持 GDP 长期增长,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将在较长时期内遭受到经济损失。如果最佳可行技术仅适用于特定的东亚国家,那么美国将遭受经济损失。除了专门针对东盟的进口关税外,东盟国家在所有情况下都不会遭受任何经济损失。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将会遭受到经济损失。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只会将东亚国家推向更深的经济一体化,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此次中美贸易问题更是掀起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热潮。Li et al(2019)借助全球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美国贸易政策政治决策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可能影响,研究发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减少了制造业就业。如果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措施,美国的损失将进一步增加。虽然国内外商品的替代效应具有正面影响,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替代效应以及报复效应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整体效应是美国制造业将失去很多就业机会。Fajgelbaum et al(2019)分析了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美国和报复性关税的变化估算进口需求和出口供应弹性的数据显示,来自目标国家的进口产品下降了 31.5%,而美国的目标出口下降了 11.0%,美国关税完全转嫁到各类进口产品价格中去造成了进口成本的大幅提高,年度消费者和生产者损失为 688 亿美元(占 GDP 的 0.37%),在考虑到较高价格对国内生产商提高关税收入和收益后,总福利损失为 78 亿美元(占 GDP 的 0.04%)。可以看出,美国关税有利于政治竞争力较强的行业部门,但报复性关税抵消了部分利益。

(三)贸易保护程度的衡量指标

贸易限制指数(Trade Restriction Index)是一套测度贸易保护程度的指标。其从微观经济基础出发,将各种贸易政策的保护水平描述为一个统一关税,该关税是在保持初始效用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使新贸易状态和初始贸易状态下的贸易收支差额保持相等的统一关税水平,这一统一关税即为贸易限制指数(Anderson & Neary,1994)。为了更加便于计算,Feenstra(1995)又结合一般均衡的贸易限制指数,构建了局部均衡的贸易限制指数,两类模型相互补充,构成了测度贸易政策保护水平的贸易限制指数理论。

Chau et al(2003)提出了一种基于距离函数法的贸易限制数量指数(TRQI),用于衡量贸易限制对福利的影响。TRQI 可分解为贸易扭曲和国内扭曲两部分。在开放与经济绩效之间相互联系中,将贸易限制所造成的经济效率低下与国内扭曲所造成的和贸易有关的经济效率低下区分开来。Anderson & Neary(2007)将 TRI 这一概念进一步扩展,以便形成与关税配额相同的贸易额。特别地,Kee(2008)等人提供了测量不同版本 TRI 的初步指导。

贸易限制指数对衡量一个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总体保护水平非常有效,该指数对于分析贸易政策的影响和减少贸易壁垒的谈判是必不可少的(Coughlin,2010)。Hoekman & Nicita(2011)回顾了贸易限制和贸易便利化的一些指标,比较了不同类型的边境贸易限制对贸易的影响。Hauk et al(2012)基于 Anderson & Neary(2005)、Kee et al(2009)的研究,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时使用了贸易限制指数(TRIs),认为 TRIs 可以有效地衡量贸易政策限制性问题。Suwanprasert(2019)认为通过关税贸易限制指数公式可以准确地测量非关税壁垒的总量,而其他指标则存在持续的测量误差,这也是贸易限制指数最新进展的有效利用。

学者们进一步拓展了贸易限制指数在不同产业的运用。Croser et al(2010)基于 75 个国家的样本对 1960—2004 年间 28 种主要农产品中的每一种进行了贸易限制指数估计,认为世界农产品市场已经高度扭曲了政府的贸易政策。Mitaritonna et al(2013)在评估新兴国家分销和电信行业时利用多元统计方法将定性数据转化为贸易限制综合指数(TRCI),估计其对价格—成本利润率的影响。Hoekman(2015)研究发现,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STRI 是影响制成品出口业绩的决定因素。服务贸易

限制对制成品出口负面影响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Hildegunn & Dorothée(2015)通过在引力模型中使用 OECD 最新的服务贸易数据,利用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分析服务贸易政策与服务跨境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服务贸易限制与服务的进口和出口都是负相关。除了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影响外,双边监管上的差异也会限制服务贸易。在研究商品以及服务出口时,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服务贸易成本被认为是跨国公司在货物和服务方面活动的最重要的政策推动力(Egger et al, 2017)。Mukherjee(2018)基于 2011 年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强调了国内政策在便利或抑制服务方面的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经合组织国家的贸易限制是导致大多数国家减少出口的原因。

(四) 贸易政策政治决策影响因素

现有主流文献主要基于保护待售模型度量贸易保护政策,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保护待售模型坚持政府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对利益集团政治献金赋予特殊权重,将政府目标函数设定为公众社会福利和政治献金的函数。现实中,贸易政策政治决策的制定、实施除受公众社会福利和政治献金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来自社会关注和就业压力等因素的影响。

1. 来自公众社会福利压力。尽管存在高昂成本,贸易保护仍然存在。很多研究分析为什么一些产业比其他产业能获得更高的贸易保护?在政治献金被广泛认可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提出的贸易政策通常都是从大局出发,也就是在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情况下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Chang et al, 2006)。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主要考虑公众福利,而并不看重政治献金,这意味着政治献金在当时被认为几乎不对贸易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另外, Freund(2008)把“损失规避”心理纳入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得出政治献金权重值比当时社会福利权重有所降低。在研究贸易分配信息是否会导致受访者将其经济利益与贸易政策偏好联系起来方面, Jamal et al(2019)认为有关贸易可能带来好处的信息会使人们对贸易自由化做出更积极的反应。在过去的 20 年中,发展中国家大大降低贸易壁垒,结果造成粮食进口激增。基于公众社会福利最大化,关注利益群体的方法对于解释西非的政策成果仍然有用, Johnson(2011)研究表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期,加纳、塞内加尔和喀麦隆大量冷冻家禽进口威胁到了国内家禽生产,于是开始要求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Falkowski et al(2014)利用二战后来自 74 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数据,探讨了政治竞争在确定农业保护水平方面是否起着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竞争的程度越高,对农业的保护越高。

2. 来自政治献金压力。Tovar(2011)认为游说支出直接影响均衡政策,并在不同部门的保护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分配权重要比政治献金低得多。Gawande(2012)为了检验并判断政府对于利益集团所赋权重的大小,直接将权重值和干扰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研究表明,如果某行业的产品被下游行业作为中间品使用,下游行业又能够组成利益集团对决策者提供政治献金,该行业所获得的保护率将会提高。Chu(2015)基于游说模型发现,只要政策制定者对所获得的政治献金给予足够多的重视,提高社会福利的政策就不成立。

3. 来自社会关注压力。与政治献金结果类似但是初衷却不同的还有社会关注理论模型。不同于政治献金是来源于利益集团的捐献,社会关注理论是政府从对社会收入关注的角度出发制定贸易政策。该理论假定各个利益集团的收入状况和权重成正比。权重越大,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越重视该集团的利益。在政府关注社会收入方面, Shmueli et al(2017)衡量了以色列决策者偏好中提高政府效率和公平标准的相对权重,并做国别比较。Cerdeiro et al(2018)研究发现,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各个国家的政策领域所采取的措施类型不同。一些国家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关停了企业,从而增加了就业的压力。Mahesh et al(2018)引入环境因素调查了关于改善环境政策的相对贡献对于全球各国政府监测的影响,并比较了这些贸易政策的执行情况。

4. 来自劳动力就业等经济压力。经济增长与稳定就业之间存在重要联系。贸易与就业关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与就业机会的相关性;二是贸易导致了就业质量提高还是降低。

例如,劳工权利、劳动报酬是改善还是恶化了。传统制造业者认为,制造业向海外输出了就业机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因此,制造业积极游说国会和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提出制造业回归本土策略。Bradford(2006)认为失业显著地影响着贸易政策,劳动力周转率和一体化率深刻地影响单个产业的发展。Bandyopadhyay et al(2011)在选用非农产品跨国贸易保护数据研究有关贸易政策的几种现有政治经济学假设时发现,“左倾”政治体制仅仅对部分贸易政策措施产生了有利于劳动力的贸易政策,收入不平等和国家层面的腐败似乎是贸易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各种贸易保护措施而言,腐败似乎倾向于通过增加劳动力丰富国家的贸易保护和减少资本丰富国家的贸易保护来损害劳工利益。

Karacaovali & Baybars(2015)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平衡生产者的政治支持和消费者的政治支持来确定关税,并对生产者的福利给予相对于普通公民更高的经济支持。与其他类似行业相比,就业、劳动力成本和优惠贸易协定(PTA)进口份额较高的部门,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比重。Chirs(2016)按照美国的贸易伙伴国排序发现,能够为就业带来显著影响的出口目标国依次为加拿大(18%)、墨西哥(14%)、中国(9%)、日本(5%)、英国(4%)、德国(3%)、韩国(3%)、荷兰(2%)。Kishishita(2019)通过构建简单的劳动力流动的两阶段模型,考察了劳动力在行业间流动对选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与贸易自由化均衡程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是由于委托—代理关系而存在的。考虑到代议制民主中不可避免的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利益冲突,研究还发现,劳动力流动的高成本是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障碍。尤其在代议制民主国家,较高的劳动力流动成本在某些情况下阻碍了贸易自由化。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可以帮助低技能工人,贸易保护会随着技能水平的提高而降低。Bradford(2019)基于政治经济学模型提出了反对这种传统观点的证据,指出贸易保护并不会随着技能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贸易保护和技能水平实际上具有正态分布关系,具有中等技能的行业比分布两端的行业会获得更多的保护。

贸易政策主要反映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中。Alexander(2019)选用年度特定产品数据分析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加拿大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1879年联邦政府推行保护性关税特点的《国家政策》以来,人们对保护主义高度关注。加拿大关税表的变化主要针对制成品进口产品,这些产品具有相对多的替代品,这些替代品是由相对大的城市中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国内制造商生产的,这种做法显然就是高度保护主义的。Timini(2019)借助贸易引力模型,重点关注中国产品出口:一是测试技术性非关税措施与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的异质性;二是验证非关税措施(NTM)的效果是否受商品类型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技术性非关税措施倾向于对贸易流量产生压力。

三、政府在贸易政策决策中的角色定位

对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具有“调停人”的性质,其活动仅仅是为了平衡不同的社会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具有“自治者”的性质,它能够充分行使自身的权力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一)政府作为“调停人”的角色定位

在代议制民主国家,利益集团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影响者,一些理论假定政府充当的是各利益集团的“调停人”角色。该类理论认为贸易政策是政府对不同的利益团体,包括政府自身、行业协会、劳工组织、本国和外国的企业,以及消费者等群体政治需求的反应。由于政府只起到调节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作用,因而其在政治决策中不具有独立的影响,政治决策的性质取决于选民和利益集团的偏好。利益集团理论认为,一个行业组成政治压力集团的能力就决定了该行业获得保护的水平。Yoshiaki & Masao(2011)通过分析国际贸易分配效应的政治反应时得出,在制造业中具有相对优势的经济体可能通过贸易保护实现较快的经济发展。Jentzsch(2017)分析战后日本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时认为,各部门利益的冲突阻碍了全面自由贸易的发展。Baimbridge et al(2017)

以欧盟为例,解释了贸易政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欧盟(EU)的其他政策,因为各成员国仍然具有竞争性,所以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利益不和谐。例如,欧盟成员国在能源和农业部门的贸易政策方面存在前所未有的不和谐程度。一些成员国目前执行的进口数量限制、反倾销、技术标准、环保要求等一系列欧盟惯用的非关税壁垒也被推广到欧盟的其他成员国中。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成员国在实施欧盟现有政策的基础上,还可能游说欧盟对更多产品的进口设置更高的门槛,这将不利于世界其他地区向欧盟出口商品。Ikeda(2018)基于本地信息的国际贸易网络和相关成本网络重构模型认为,在政府贸易保护政策背景下,从美国到日本的食物进口大幅增加,使进口成本减半;对于机械类产品,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大幅下降,出口成本增加了一倍,而对欧盟的出口则增加了。显然,政府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政策的效率存在差异。

政府作为调停人的另一个模型是 Caves(1976)提出的推进器模型(Adding Machine Model)。该模型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一个行业的选举力量。由于个人消费者缺乏信息,并且相对于收益来说,政治活动的成本太大,他们往往不直接反对贸易保护,所以贸易保护模式由生产者利益集团形成。由于政府官员希望选举概率最大化,因而获得贸易保护的关键在于一个行业的选民数量。该理论强调的不是每个行业必须进行政治活动的动机,而是行业所拥有的选举力量。然而,行业选举力量主要指标是劳动—产出系数和地理分散程度,这两个指标与行业保护水平之间的预期表现为正相关的关系。研究表明,高度竞争的行业倾向于集体游说,而高度集中的行业倾向于单独游说(Bombardini & Trebb, 2012)。贸易保护政策在两部门贸易模式(Krugman, 1980)下进行的,其考虑了工资、进出口补贴、税收等变量,并将贸易政策与有效分配进行比较(Campolmi et al, 2014)。Missaglia & Valensisi(2014)进一步考查了贸易自由化的总体影响,各国贸易自由化程度因其财政税收影响会略有缩减,贸易政策开始向贸易保护主义方向倾斜。Mitra(2015)认为应该采用统一关税政策,因为它将导致相对价格扭曲程度最小,同时又减少了游说的动机,并使其无效。Madeira(2016)借助经济学中的新贸易理论,在引入企业异质性和游说时发现,由于成员企业之间存在竞争性贸易优惠,行业内部贸易增加,各个公司之间的政治活动也变得更加活跃。单边贸易模式表明,进口关税具有最佳创收水平,因此无论自由化经济是大还是小,贸易保护总是可取的(Demidova, 2017)。进一步研究行业内部两种外商直接投资模式发现,在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模式下,对行业游说保护贸易的影响也各有不同。在绿地投资的情况下,公司游说的动力会减少。相比之下,在并购投资的情况下,外国公司收购国内公司,国内生产者集中度应该增加。这反过来可能加剧该行业的政治“权重”,或使国内公司更容易协调集体行动。因此,被并购部门的国内企业能够进一步努力游说获得贸易保护(Hak et al, 2018)。面对高关税,企业可能将其产品误分类为低关税税率,如果存在政治利益,则会因为官僚能力的低下限制政府对关税的实施能力。

(二)政府作为“自治者”的角色定位

当政府作为“自治者”时,其首要考虑的是国家整体利益。因而,该类模型将贸易政策视为政府出于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考虑而提供的公共物品,政府目标函数在其所实行的保护水平和结构下得以实现最大化(Herrmann et al, 2017)。Corden(1971)提出了“保守的社会福利函数”,其核心思想是政府将给予因进口激增而遭受严重损失的行业以更大的保护力度。Lavergne(1983)在 Corden(1971)保守的社会福利函数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影响模型,认为一个行业的历史保护水平对当前保护水平有很强的影响。Voeten(2012)认为,国家间的共同政治利益是良好国际关系的重要标志,政治关系不好的国家需要有额外的政治关系代理。而且,贸易保护会随着立法代表制的选举规则而变化。在解释这种相关性时,选区规模和党派力量都不重要,国家规模确实很重要,但不能解释整体相关性(Hatfield & Hauk, 2014)。贸易保护政策可以改变公共物品数量,这是因为征收关税产生的收入效应可以增加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导致不断扩大的公共部门挤占进口竞争行业部门(Biswas, 2015)。Sarah(2017)从两方面研究了专制和民主化下的贸易政策新模式,一是通过研究政府形式与贸易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深入地理解政治制度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二是展示专制政权如何操纵贸

易政策,以便在面对永久性的世界价格冲击时保持对权力的控制,从而为重新审视贸易政策对技术冲击的反应打开了大门。该模型解释了1815—1846年间贸易政策制定事件,期间英国大幅度放开贸易,而普鲁士则在粮食市场增加了保护主义。

(三)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

利益集团模型理论表明,利益集团及其游说在贸易政策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Hillman(1989)首次提出政治支持模型。该模型假设政府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集团以及消费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团与消费者之间做出权衡。政府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政治支持最大化。

在利益集团模型日益完善的过程中,一部分学者结合新的变量和因子来考虑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研究使得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这一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广化。Ixchel(2017)探讨了将利益集团代表纳入欧盟机构(EAs)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的决定。政府间关系(IGR)是政府之间在垂直和水平上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研究表明,各机构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一些机构有正式规则,并明确分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表人数。此外,利益集团代表有权在一些具有IGR的机构中投票,而在其他机构中,他们只有咨询角色。通常来看,代表有资本代表(例如工业)、劳工代表(例如工会)和公民代表(例如非政府组织或消费者团体)三大类群体。信息机构比管理任务的机构更有可能拥有IGR,欧洲的议会参与选举更有可能导致为IGR提供条款。欧洲食品安全局和欧洲工作安全与健康局的案例研究表明,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推动欧盟机构将IGR纳入选举来发挥重要作用。Breunig et al(2018)将利益集团模型用于测算政策稳定性,并选用1984—2010年间美国各州预算函数,采用广义加权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发现,捕获(低利益集团密度,低关注度)、死锁(高利益集团密度,高度关注)导致低水平的政策波动、稳定(中等利益集团密度,间歇性关注)导致高水平的政策波动等三种类型情况。

四、总结

在不同政治经济背景下,上述研究是应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贸易政策形成问题的有益尝试和探索。对于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还需要完善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现有模型已经认为,在不同政治经济背景下,政治献金作为影响政府的手段并不合适,但是需要明确各方政治参与者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影响决策者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也应该考虑外国政府作为外国利益集团的代表,如何利用各种国际贸易规则对中国政府造成了哪些影响。此外,学界也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际贸易政策及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联进行研究。本文认为要以国际贸易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学进行重点研究和分析;从国际和国内层面研究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从研究DUP、选择贸易政策工具以及分析贸易政策决策三个方面对其具体应用进行分析。当今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是随着这些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美国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与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由“保护贸易—自由贸易—保护贸易”的转变过程相契合,需要对此深入研究。

第二,被解释变量选取应该根据所选用数据特点而定。对于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名义关税率差距并不大,往往无法代表各部门所受到的贸易保护水平,因此在多数文献中采用非关税壁垒代替名义关税率。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情况则有所不同,各个部门间的名义关税率差距比较明显,而非关税壁垒则较少使用。因此,采用名义关税率或者实际保护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比较合适。

第三,现有研究对贸易保护政策表现形式的界定不够全面。贸易保护政策的表现形式非常多,而在大多数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只将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表现形式。但是对于非关税壁垒,以及与服务贸易紧密相连的政府管制等贸易措施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欠缺。所以,如何将非关税

壁垒和一些政府管制措施转化为定量指标,从而构建能反映贸易保护程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将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 Acharya, R. C. (2018), "Endogenous trade policy in general equilibrium: An interaction of redistribution rule, trade openness, and labor market condition", *Economics & Politics* 30(3):423-443.
- Alexander, P. D. (2019), "Responding to the first era of globalization: Canadian trade policy, 1870-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9(3):826-861.
- Amrita, S. (2019), "Trade policy and lobbying effectiveness: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India",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6:165-192.
- Anderson, J. E. & J. P. Neary(1994), "Measuring the restrictiveness of trade policy",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8(2):151-169.
- Anderson, J. E. & J. P. Neary(1996), "A new approach to evaluating trade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3(1):107-125.
- Baimbridge, M. et al(201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 trade policy: Energy and agricultural trade with Russia", In: *The Segmentation of Europe*, Palgrave Macmillan UK.
- Baldwin, R. E.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Integrating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MIT Press.
- Bandyopadhyay, S. (2011), "Political economy determinants of non-agricultural trade polic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93(2):89-104.
- Barros, N. et al(2019), "Environmental and biological monitoring of benzene, toluene, ethylbenzene, and xylene (BTEX) exposure in residents living near gas stations", *Journal of 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Part A* 82(9):77-82.
- Bechtel, M. M. et al(2012), "The green side of protectionism: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three facets of trade policy preferenc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5):837-866.
- Bednar, M. (2019), "Trade policy barriers to imports of EU goods to the USA: Importance of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flows", *Politická Ekonomie* 67(3):231-252.
- Bernauer, T. (2017), *Deriving People's Trade Policy Preferences from Macroeconomic Trade Theory: Economic Ideas You Should Forget*, Springer.
- Biswas, R. (2015), "Tariffs that may fail to protect: A model of trade and public goods", *Economics Bulletin* 35(1):361-370.
- Bombardini, M. (2008), "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bby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5(2):329-348.
- Bradford, S. (2006), "Protection and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9(2):257-271.
- Bradford, S. (2019), "Protection and skills: Does trade policy favor low-skill worker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7(3):981-1000.
- Breunig, C. & C. Koski(2018), "Interest groups and policy volatility", *Governance* 31(2):279-297.
- Campolmi, A. et al(2014), "Trade policy: Home market effect versus terms-of-trade externa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3(1):92-107.
- Canto, V. A. & A. Wiese(2018), "The US experience: An interpretation", In: J. S. Bentley et al(eds), *Economic Disturbances and Equilibrium in An Integrated Global Economy*, Academic Press.
- Caves, R. E. (1976), "The determinants of market structure: Design for research", In: H. W. Jong et al(eds), *Markets, Corporate Behaviour and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pringer.
- Cerdeiro, D. & R. Nam(2018),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trade policy indicators", IMF Working Paper, No. 18/32.
- Chang, P. L. et al(2005), "Protection for sale under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6(2):509-526.
- Chau, N. H. et al(2010), "Trade restri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4(3):1079-1095.
- Chen, P. L. et al(2006), "Protection for sale with heterogenous interests within industries", Working Paper, No. 22-25, School of Economics,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 Chirs, R. & S. Xu (2016), "Job supported by export destination", Office of Economic Analysis,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vailable at <http://www.trade.gov/mas/ian/employment/index.asp>.
- Chu, H. et al(2015),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ax havens", *International Tax & Public Finance* 22(6):956—976.
- Coughlin, C. C. (2010),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A primer on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ic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92(5):381—394.
- Corden, W. M. (1971), *The Theory of Protection*, Clarendon Press.
- Croser, J. L. et al(2010), "How do agricultural policy restrictions to global trade and welfare differ across commod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2(3):698—712.
- Demidova, S. (2017), "Trade policies, firm heterogeneity, and variable markup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8:260—273.
- Devashish, M. et al(2002), "Protection for sale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Democracy vs. dictatorship",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4(3):497—508.
- Di Tella, R. & D. Rodrik(2019), "Labor market shocks and the demand for trade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online survey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705.
- Djerdjian, D. O. (2010), "Economics versus politics in trade policy",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6(2):223—240.
- Egger, P. et al(2015), "Cross-country services versus manufacturing activity of multinational firms in response to services versus goods policy", *World Economy* 40(3):490—498.
- Facchini, G. et al(2010), "Protection for sale with imperfect rent capturing",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9(3):845—873.
- Fajgelbaum, P. D. et al(2019), "The return to protectionism",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638.
- Falkowski, J. & A. Olper(2014),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policy choices: The evidence from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5(2):143—158.
- Feenstra, R. C. (1995),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No. 5051.
- Francois, J. & D. R. Nelson(2014), "Political support for trade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6(1):243—253.
- Freund, C. & C. Ozden(2008), "Loss aversion and trade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4):75—91.
- Gawande, K. et al(2012), "African capacity building for meat exports: Lessons from the Namibian and Botswanan beef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Journal* 19(4):55—78.
- Grossman, G. M. & E. Helpman(1994), "Protection for sa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4):833—850.
- Grossman, G. M. & E. Helpman(1995), "The politics of free-trade agree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4):667—690.
- Gu, Z. H. & Y. Shen(2014), "Research on affecting factors for Chinese trade protectionist policy under open circumstanc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test on trade political economics", <http://mpa.ub.uni-muenchen.de/57753/>.
- Haaland, J. I. & A. J. Venables (2016), "Optimal trade policy with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heterogeneous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2:85—95.
- Hatfield, J. W. & W. R. Hauk(2014), "Electoral regime and trade polic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2(3):518—534.
- Hauk, R. et al(2012), "Trade restriction indices and US trade policy",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19(8):795—799.
- Hak, L. (2018), "Entry mod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dustry demand for trade protecti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Review* 10(1):1—12.
- Hatch, F. (2017), "Book Review: *Building Legislative Coalitions for Free Trade in Asia: Globalization as Legislation* by Megumi Naoi",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43(1):236—240.
- Herrmann-Pillath, C. (2017), "Deliberative trade policy: Re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https://ssrn.com/abstract=3034102>.
- Hildegunn K. N. & R. Dorothée(2015), "The impact of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on trade flows", *World Economy* 40(6):1155—1183.
- Hillman, A. L. (1982), "Declining industries and political-support protectionist motiv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5):1180—1187.
- Hillman, A. L. & H. W. Ursprung(198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ction*,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 Hoekman, B. & B. Shepherd(2015), "Services productivity, trade policy and manufacturing exports", *World Economy* 40 (3):499—516.
- Hoekman, B. & A. Nicita(2010), "Trade policy, trade costs, and developing country trade", *World Development* 39 (12):2069—2079.
- Houseman, S. N. et al(2014), "Measuring manufacturing: How the computer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ies affect the numbers and perceptions", Upjoh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No. 14—209.
- Ina, C. et al(2017), "Trade policy preferences and factor abund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6:1—19.
- Inkyo, C. & T. Jose(2018),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 rise in US trade protectionism on East Asia", *Journal of Korea Trade* 22(3):265—279.
- Ikeda, Y. & H. Iyetomi(2018), "Trade network reconstruction and simulation with changes in trade policy", *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 15(2):495—513.
- Ixchel, P. (2017), "Interest group representation in the formal design of European Union agencies", *Regulation & Governance* 12(2):238—262.
- Jain, S. & S. Majumdar(2016), "State capacity, redistributive compens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42:462—473.
- Jamal, A. & H. V. Milner(2019), "Economic self-interest, information, and trade policy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an experiment in Tuni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6(4):545—572.
- Jentzsch, H. (2017), "Book Review: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ese Trade Policy*, Edited by Aurelia George Mulgan and Masayoshi Honma", *Pacific Affairs* 90(2):352—354.
- Johnson, M. C. (2011), "Lobbying for trade barriers: A comparison of poultry producers' success in Cameroon, Senegal and Ghan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9(4):575—599.
- Karacaovali, B. (2015), "Varying political economy weights of protection: The case of Colombia", *Economics & Politics* 27 (2):290—312.
- Kagitani, K. (2011), "Domestic unioniz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rategic export polic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25(3):493—512.
- Kishishita, D. (2019), "Does high labour mobility always promote trade liberaliz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52(3):1223—1247.
- Krishna, K. (2005),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6 (2):67—72.
- Krpec, O. & V. Hodulak(2012),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Institutions, regula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Politická ekonomie* 60(1):20—39.
-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5):950—959.
- Lavergne, J. & A. Petrovic(1983), "Discontinuities in occlusal relationship and the regulation of facial growth: A cybernetic view", *European Journal of Orthodontics* 5(4):269—278.
- Leonardo, B. et al(2018), "Intra-industry trade,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preferential tariff lib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2(2):329—340.
- Li, Z. et al(2019),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tatistics & Decision* 12(7):154—157.
- MacKenzie, I. & M. Ohndorf(2012), "Cap-and-trade, taxes, and distribu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63(1):51—65.
- Madeira, M. A. (2016), "New trade, new politics: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oali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4):677—711.
- Magee, S. P. et al(1989), *Black Hole Tariffs and Endogenous Policy Theory: Political Economy in General Equilibriu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ggi, G. et al(2007), "A political theory of trade agree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4):1374—1406.
- Mahesh, R. et al(2018),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recommended food environment policies to improve population nutrition: Results from a Delphi study with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experts",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21(11): 2142—2148.

- Marks, S. V. (2015), "The Asian-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Political economy in Indonesia",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51(2):287–306.
- Matschke, S. D. (2006), "Issues matter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US trade policy? An empirical reevalu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1):405–421.
- Mayer, W. (1984), "Endogenous tariff 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5):970–985.
- Meyer, T. (2017), "Saving the political consensus in favor of free trade", *Vanderbilt Law Review* 70(3):985–1026.
- Mitaritonna, L. et al(2013), "Assessing barriers to trade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telecom sectors in emerging countries", *World Trade Review* 12(1):57–78.
- Mitra, D. (201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to Latin America", *Economics & Politics* 51(3):301–314.
- Missaglia, M. & G. Valensisi(2014), "Trade policy in Palestine: A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36(5):899–923.
- Mukherjee, B. et al(2009), "Labor mo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de protection in majoritarian democracies", *Journal of Politics* 71(2):291–308.
- Mukherjee, D. (2018), "Services traded for intermediate and final usage: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services FTAs and restri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45(3):459–497.
- Mulgan, A. G. & M. Honma(201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ese Trade Policy*, Palgrave Macmillan UK.
- Nakayama, K. et al(2006), "Multiple frequency stabilization of lasers using double saturation spectroscopy", *Optics Communications* 259(1):242–250.
- Oladi, G. R. (2012), "Net campaign contributions, agricultural interests, and votes on liberalizing trade with China", *Public Choice* 150(3):745–769.
- Olper, A. et al(2014), "Political reforms and public policy: Evidence from agricultural and food policie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8(1):21–47.
- Plouffe, M. (2017), "Firm heterogeneity and trade-policy stance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Japanese producers", *Business and Politics* 19(1):1–40.
- Reynolds, A. (2019), "Evaluating trade policies: The political engagement of religious actors in Costa Rica,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6(4):1–18.
- Rho, S. & M. Tomz(2017), "Why don't trade preferences reflect economic self-intere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1(S1):85–108.
- Saha, A. (2019), "Trade policy & lobbying effectiveness: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India",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6(1):165–192.
- Sarah, B. M. (2017), "A tale of two trade powers: Balancing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and environmental risk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United States in a changing political climate", *Fordham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29(1):95–97.
- Sengupta, A. (2018), "India's trade policy: Which way now?", *Decision* 45(2):129–145.
- Seungjoo, L. (2017),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age of uncertainty: The crisis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7(4):237–271.
- Shmueli, A. et al(2017), "Efficiency and equity considerations in the preferences of health policy-makers in Israel", *Israel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Research* 6:18, DOI 10.186/s13584-017-0142-7.
- Stiglitz, J. E. (2013), "The free-trade charade", *Project Syndicate*,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ansatlantic-and-transpacific-free-trade-trouble-by-joseph-e-stiglitz>.
- Suwanprasert, W. (2019),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of non-tariff barriers under the CES preference", <https://doi.org/10.1080/10168737.2019.1671475/> on Sep 19.
- Stoyanov, A. (2009), "Trade policy of a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lobby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7(1):37–49.
- Sugimoto, Y. & M. Nakagawa(2011), "Endogenous trade policy: Political struggle in the growth proces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2(1):12–29.
- Thies, C. G. (2015), "The declining exceptionalism of agriculture: Identifying the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 of agricultural trade protection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2(2):339—359.
- Timini, J. & C. Marina(2015), “Heterogeneous effects at the product level”,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34(2):327—345.
- Tommasi, M. et al(2017), “State capacity and the quality of policies: Revis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ness and government size”, *Economics & Politics* 29(2):133—156.
- Tovar, P. (2011), “Lobbying costs and trade poli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3(2):126—136.
- Urbatsch, R. (2018), “Immigrant out-groups and voting against free trad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4(6):1065—1080.
- Van der Ploeg, F. (2017),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st: Populists versus policy wonks”, *University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33(1):4—16.
- Voeten, E. (2012), “Data and analyses of voting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https://ssrn.com/abstract=2111149>.
- Wagner, P. & M. Plouffe(2019), “Electoral systems and trade-policy outcomes: The effects of personal-vote incentives on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Public Choice* 180(3):333—352.
- Wang, X. S. & S. X. Xie(2014), “The micro-formation mechanism of trade conflicts betwee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ia’s anti-dumping action against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5(2):64—82.
- Wang, C. C. & J. R. Chiou(2015), “An analysis of policy harmonization on privatizat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38:279—290.
- Wu, Y. Q. (2011),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olicy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alysis based on protection for sale model”,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AIMSEC 2011—Proceedings*, pp. 5686—5690.
- Zissimos, B. (2017), “A theory of trade policy under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t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9:85—101.

Research Progress on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FENG Bimei ZHAO Difei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Abstract: Combining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with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d exploring the formul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economics, which has risen rapidly since the 1980s. By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endogeneity of trade policy, or carrying out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scholars investigated the determinants and restrictions of trade policy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on, and explore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of trade policy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research. Existing studies analyzes how trade policy affects trad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trade policy and welfare analysis. Empirical research centered on the efficiency of trade protection policy and gains from lobbying, including the determinants and policy-making process of trade protection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s of interest model.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differences in trade prot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discussed, in the hope of improving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of China’s trade policy.

Keywords: Trade Policy; Political Economy; Interest Group; Trade Protection

(责任编辑:刘洪愧)

(校对:刘新波)